



国际法委员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2014年5月5日至6月6日和

7月7日至8月8日，日内瓦

国际法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报告草稿

报告员：迪雷·特拉迪先生

第九章

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

增编

目录

	段次	页次
C.2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		
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1



C.2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

1. 委员会第六十六届会议暂时通过的条款草案案文及其评注载录如下。

第 2 条草案

定义

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

.....

- (e) “国家官员”是指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的任何个人。

评注

(1) 第 2 条草案(e)项的目的是为了界定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个人，即“国家官员”。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应当有一个国家官员的定义，因为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适用于个人，个人构成豁免的主体要素。此外，界定国家官员的概念通过明确区分其两个规范要素，即豁免适用的主体和豁免涵盖的行为，有助于了解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构成。不过，有些委员会委员对是否需要列入这一定义表示怀疑。

(2) 第 2 条草案(e)项所载“国家官员”概念的定义具有一般性，适用于任何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人，无论是属人豁免还是属事豁免。因此，第 2 条草案(e)项的性质和目的不应与界定谁享有每一类豁免的第 3 条和第 5 条草案的性质和目的相混淆。¹ 享有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人员根据“国家官员”的定义来确定，这两类豁免都涉及“国家官员”。

¹ 第 3 条草案指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对外国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属人豁免”(《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8/10)》，第 48 段，第 52 页)。第 5 条草案指出，“国家官员在以此种身份行事时，对外国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属事豁免”(A/CN.4/L.850)。

(3) 国际法中并没有“官员”或“国家官员”概念的一般定义，尽管在某些国际条约和文书中可以找到这两个词。² “国家官员”或简单的“官员”的概念在具体的国内法律制度中，所指可能不同。因此，本评注中提到的“国家官员”的定义是自主性的，必须理解为是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而拟订的。

(4) “国家官员”定义中使用的“个人”一词与自然人同义，表明只有自然人才能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这种豁免不涵盖任何形式的所谓法人。委员会认为，在当前的实践中，没有根据可以断定这些条款草案中提到的豁免适用于法人，尽管在有些国家法律制度中，法人可能承担刑事责任。

(5) 如前所述，“国家官员”必须被理解为包括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员和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在这点上，必须指出的是，委员会用来确定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员的办法是列出第 3 条草案列举的此类个人，即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但在第 2 条草案(e)项中，决定不明确提及这些人，因为他们本身被视为本条款草案所指的“国家官员”；因此，从定义上讲，不能区别于其他国家官员。

(6) 关于属事豁免适用的“国家官员”，委员会认为无法使用列举办法来确定。鉴于豁免可以适用的个人和确定哪些人是官员的国家法律制度多种多样，委员会认为无法拟订一个详尽无疑的名单，包含属事豁免涵盖的所有个人。出于同样的原因，委员会认为拟订这种豁免所适用个人的指示性名单也是不可能或不合适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名单必然都是不完整的，因为无法编制国内法律制度包含的所有国家官员的姓名目录，名单必须不断更新，并且可能给负责适用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政府机构造成困惑。因此，为属事豁免目的可被称为“国家官员”的个人必须根据定义中所包含并表明国家与官员之间关系(即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的标准逐案确定。

² 下列多边条约使用了这两个词语：《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禁止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公约》；《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反腐败刑法公约》(欧洲委员会)；《美洲反腐败公约》；《非洲联盟预防和打击腐败公约》。为界定“国家官员”的目的而对这些文书所作的分析，见特别报告员康塞普西翁·埃斯科瓦尔·埃尔南德斯关于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第三次报告，A/CN.4/673，第 51 至第 97 段。

(7) 不过，下面将举出一些国内和国际司法实践中出现的“国家官员”实例，这些实例仅为指示性目的，而非意在罗列享有豁免的个人。为更加明确起见，将这些实例分为四组：

(一) 一名前国防部长、各种军衔的军官、某海事当局的一名负责人以及政府安全部队和机构的各种成员(包括苏格兰场主任)被给予刑事管辖属事豁免。³

(二) 一名副总统兼林业部长、一名前国防部长、一名国家安全机构负责人、各种军衔的军官、一名前国家元首、边防警卫和一名公务员(退休军

³ 在若拉(Joola)号班轮受害者家庭协会一案中，法国上诉法院刑事庭承认一名前塞内加尔国防部长享有刑事起诉豁免权。该法院在 2010 年 1 月 19 日的裁决中，认为“外国以及在其指示下或代表其行事的组织和个人只有在引起争议的行为从性质或目的上来说构成行使这些国家主权一部分的情况下，才能免于起诉”；见若拉(Joola)号班轮受害者家庭协会，上诉法院刑事庭(法国)，2010 年 1 月 19 日的判决。正式的法文文本如下：“les Etats étrangers et les organismes ou personnes agissant par leur ordre et pour leur compte ne bénéficient de l’immunité de juridiction qu’autant que l’acte qui donne lieu au litige participe, par sa nature ou sa finalité, à l’exercice de la souveraineté de ces Etats”。在 Jones 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一案中，军队的一名中校及沙特阿拉伯安全部队和机构的一些成员被视为享有这种职能豁免。联合王国上议院在 2006 年 6 月 14 日的判决中认为，所有这些个人均为国家官员，他们在履行公务时实施的行为引起了刑事诉讼。上议院在其分析中首先指出，“所有被告在有关时刻是以……王国公务员或代理人的身份行事”：见琼斯诉沙特阿拉伯王国内政部，上议院(联合王国)，2006 年 6 月 14 日的判决(康希尔的宾汉姆勋爵，第 11 和第 13 段)。在国库司法代表诉马耳他海事当局和 Carmel X 一案中，法国上诉法院刑事庭授予马耳他海事当局执行主任刑事起诉豁免权。上诉法院在 2004 年 11 月 23 日的裁决中，重点审查了该个人实施的行为的公务性质以及他与国家的关系，并结合这些考虑因素，认为他“实施的行为是在代表马耳他和在在马耳他控制下履行公务人员的职能”：见国库司法代表诉马耳他海事当局和 Carmel X，上诉法院刑事庭(法国)，2004 年 11 月 23 日的判决。正式的法文文本如下：“d’actes de puissance publique accomplis dans le cadre de ses fonctions pour le compte et sous le contrôle de l’État de Malte”。在 Schmidt 诉联合王国政府内政大臣的案件中，爱尔兰最高法院 1997 年 4 月 24 日的判决也承认一名警官享有这种属事豁免。最高法院强调了这种豁免的职能性，指出该个人“打算和有意履行并且事实上正在履行其职责和职能”：见 Schmidt 诉联合王国政府内政大臣，最高法院(爱尔兰)，1997 年 4 月 24 日的判决。在山达基教会一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苏格兰场一名主任免于刑事起诉的问题作出了裁决。该法院在 1978 年 9 月 16 日的判决中，承认他享有豁免权，断定他“是以明确任命的英国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行事”，“他的行为构成直接的国家行为”——见山达基教会案，联邦最高法院(德国)，1978 年 9 月 16 日的判决(以英文载于《国际法案例汇编》，第 65 卷，第 198 页)。《国际法案例汇编》中的英译本内容如下：“苏格兰场——因此其负责人——是在以明确任命的英国国家代理人的身份行事……此类代理人的行为构成直接的国家行为”。

官)也被各国法院视为“国家官员”，尽管他们不被认为享有豁免权。⁴ 不过，虽然这些具体案件中的豁免请求没有得到支持，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内法院认为这些案件不涉及本条款草案意义范围内的“国家官员”。不予豁免是出于国家官员身份以外的原因，对驳回豁免请求的原因所作的解释表明，这些法院审查了受审人员是否拥有官员身份的问题。

⁴ 在 Teodoro Nguema Obiang Mangue 等人的案件中，副总统兼林业部长的免于刑事起诉请求被巴黎上诉法院否决，该法院在 2013 年 6 月 13 日的判决中，认为刑事事项中免于起诉的这种属事豁免“仅限于执行公务”。但法院没有质疑他是否是国家官员：见 Teodoro Nguema Obiang Mangue 等人案，巴黎上诉法院，第二预审厅(法国)，2013 年 6 月 13 日的判决。正式的法文文本是：“trouve ses limites dans l'exercice de fonctions étatiques”。在意大利诉印度联邦和 Massimiliano Latorre 等人诉印度联邦的案件中，印度最高法院 2013 年 1 月 18 日的判决承认印度当局有权调查几名印度水兵的行为并作出判决，这些水兵在执行反海盗监督和保护任务时，向与印度相邻的某区的一艘船只开火。法院援引了印度在海洋法、尤其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作出的承诺。该案也没有质疑他们是否是国家官员：见意大利诉印度联邦和 Massimiliano Latorre 等人诉印度联邦，最高法院(印度)，2013 年 1 月 18 日的判决(Altamas Kabir, 第 101 段)。在 A.诉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B.和 C.一案中，对于前国防部长不再行使公职前后实施的行为，瑞士联邦刑事法院未赋予他免遭刑事起诉的属事豁免权。尽管瑞士法院承认被告曾是一名国家官员，但它在 2012 年 7 月 25 日的判决中，还考虑到上议院 1999 年 3 月 24 日就 Regina 诉 Bartle 和市警察局长等人，皮诺切特缺席一案(该案涉及一名前国家元首)作出的判决中对这种职能豁免所持的立场，认为一方面“表示希望打击这类严重违反人类基本价值观的行为，另一方面又接受对职能豁免(属事豁免)规则的广泛解释”，是自相矛盾的：见 A.诉瑞士总检察长办公室、B.和 C.，联邦刑事法院(瑞士)，2012 年 7 月 25 日的判决，第 5.4.3 段。正式的法文文本如下：“on affirmait vouloir lutter contre ces violations graves aux valeurs fondamentales de l'humanité, et, d'un autre côté, l'on admettait une interprétation large des règles de l'immunité fonctionnelle (ratione materiae)”。在 Khurts Bat 诉德国联邦法院调查法官一案中，联合王国法院未对一名高级国家安全官员给予豁免，尽管该法院在 2001 年 7 月 19 日的判决中，没有就他可被视为国家官员的问题提出异议：见 Khurts Bat 诉德国联邦法院调查法官，高等法院王座法庭行政庭(联合王国)，2001 年 7 月 19 日的判决，第 99 至第 101 段。在检察官(米兰法院)诉 Adler 等人的案件中，米兰法院第四刑事法庭不承认负责意大利境内某一军事基地的一名美国上校享有刑事起诉豁免。该法院在 2010 年 2 月 1 日的判决中，认为事件不属于被告援引的《北大西洋公约》缔约方《关于部队地位的协定》(1951 年 6 月 19 日)第七条第 2 款的范围：见检察官(米兰法院)诉 Adler 等人，米兰法院第四刑事法庭(意大利)，2010 年 2 月 1 日的判决。在美利坚合众国诉 Noriega 案中，第十一巡回区上诉法院 1997 年 7 月 7 日的判决拒绝对一名武装部队前总司令给予刑事起诉豁免。值得注意的是，法院在 1997 年 7 月 7 日的判决中，只考虑了该人是否享有属人豁免权，而排除了从属事豁免角度评估豁免的可能性，虽然它承认该人的国家官员身份：见美利坚合众国诉 Noriega，第十一巡回区上诉法院(美国)，1997 年 7 月 7 日的判决。在起诉边防警卫案中，德国联邦最高法院 1992 年 11 月 3 日的判决驳回了被告就起诉豁免提出的论点，宣布他们不能被视为外国代表，因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不复存在：见起诉边防警卫案，联邦最高法院(德国)，1992 年 11 月 3 日的判决。在 In re Doe 案件中，美国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拒绝授予一名前国家元首及其妻子刑事诉讼豁免权。根据美国行政部门的一项法律意见，该法院在 1988 年 10 月 19 日的判决中认为，由于两人的刑事起诉豁免权被撤销，有充分的理由不给予他们任何形式的豁免。在这方面，应当指出的是，行政部门并未明确反对前国家元首及其妻子可享有某种形式余效豁免的观点——见 In re Doe 案，第二巡回区上诉法院(美国)，1988 年 10 月 19 日的判决。最后，在 R.诉兰贝斯法官，Yusuflu 缺席一案中，联合王国的一个法院拒绝授予一名官员刑事诉讼豁免，认为根据该案中的证据，不适合给予他外交人员豁免，因为他的这种身份没有得到充分证明——见 R.诉 R.诉兰贝斯法官，Yusuflu 缺席案，高等法院分庭(联合王国)，1985 年 2 月 8 日的判决。

(三) 一名检察长、一名前情报处处长、一名前国家安全机构主管、一位前国家元首、一位联邦州(佛罗里达)检察长和佛罗里达一些级别较低的官员(一名检察官及其法律助理、检察长办公室的一名侦探和佛罗里达州机构的一名律师)和以为政府人员在援引管辖豁免的民事诉讼中均被认为是国家官员。⁵ 虽然这些实例没有专门提到刑事管辖豁免,但从技术角度看它们具有相关性,因为所有这些判决中,国内法院都对要求享有或被准予民事诉讼豁免者的“国家官员”身份阐明了立场。

(四) 一名共和国检察官和一名国家安全主管、一位内政部长、一名中校、某个监狱的副狱长、两名警官、一位国防部长和一名国家档案局负责人被国际法院、欧洲人权法院和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认为是本条款草案意义范围内的国家官员。⁶

(8) 必须注意的是,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可享有本条款草案意义范围内的属人和属事两种豁免。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3条草案特别对第一种假设作出了规定。第二种假设反映在委员会同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4条草案第3款中,该款规定,“属人豁免的停止不妨碍关于属事豁免的国际法规则的适用”。⁷ 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享有属人豁免或属事豁免的条件将取决于本条款草案的其他规定所载的适用于每一类豁免的规则。⁸

(9) 必须指出的是,“国家官员”的定义仅指享有豁免的人,并不预先判断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涵盖哪些行为的问题或暗含对这一问题的任何表述。从这个角度来看,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在确定个人为国家官员时应当考虑的基本要素是该人与国家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种联系反映在第2条草案(e)项中,其中提到有关

⁵ 已故 Zahra (Ziba) Kazemi 的遗产和 Stephan (Salman) Hashemi 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Ayatollah Ali Khamenei、Saeed Mortazavi 和 Mohammad Bakhshi, 高等法院商事分庭(加拿大), 2011 年 1 月 25 日的判决, 第 153 段; 上诉人 Ali Saadallah Belhas 等人诉 Moshe Ya'alon, 哥伦比亚巡回区上诉法院(美利坚合众国), 2008 年 2 月 15 日的判决; Ra'Ed Mohamad Ibrahim Matar 等人诉 Avraham Dichter, 纽约南区法院(美国), 2007 年 5 月 2 日的判决; A、B、C、D、E、F 和处境类似的其他人、Wei Yu 和 Hao Wang 诉江泽民和处理法轮功问题办公室(6/10 办公室), 伊利诺伊州北区法院, 东部分庭(美国), 2004 年 9 月 8 日的判决; Jaffe 诉 Miller 和其他人, 安大略州上诉法院, 1993 年 6 月 17 日的判决; 以及 Rukmini S. Kline 等人诉 Yasuyuki Kaneko 等人, 纽约州最高法院(美国), 1988 年 10 月 31 日的判决。

⁶ 国际法院, 刑事事项互助的若干问题(吉布提诉法国)案, 判决, 《2008 年国际法院判例汇编》。欧洲人权法院, Jones 和其他人诉联合王国(申请号 34356/06 和 40528/06), 2014 年 1 月 14 日的判决。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上诉庭, 检察官诉 Tihomir Blaškić, IT-95-14-AR 108, 1997 年 10 月 29 日的判决。

⁷ 《大会正式记录, 第六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 A/68/10, 第 48 段, 第 52 页。

⁸ 在这方面, 应当忆及, 第 4 条草案评注第(7)段指出: “委员会认为该‘不妨碍’条款只是不排除这种可能性, 即在符合关于属事豁免的规定时, 可以对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外交部长在任期间以公务身份实施的行为适用属事豁免。第 3 款没有预先判断属事豁免机制的内容, 这将在条款草案第三部分制定”(《大会正式记录, 第六十五届会议, 补编第 10 号》, A/68/10, 第 49 段, 第 70 页)。

个人“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这一陈述简单明了，总结了特别报告员关于确定官员的标准的提议，⁹ 并重申了委员会 2013 年接受的建议，即本条款草案与“代表一国或为一国利益行事的人员可享有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有关。¹⁰ 最后，应当注意的是，国家官员可能满足这两个要求或只满足其中一个要求。

(10) “代表.....的人”一语必须从广义上理解为包括任何履行代表职能的“国家官员”。提及代表对于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特别重要，因为——如第 3 条草案的评注所述——“任这些职位的人员仅凭其职务就可在国际关系中直接代表国家而无需国家专门授权其这样做”。¹¹ 不过，这里提到的代表国家根据国家制度本身的规则或法律，还可适用于除所谓“三巨头”以外的国家官员。因此，官员是否代表国家须逐案确定。最后，必须指出的是，单独提到代表国家，以此作为确定与国家之间联系的一个标准，可将某些类别的个人、特别是议会制的君主涵盖进来，从严格意义上讲，很难说他们在履行国家职能，但他们确实是代表国家的。

(11) “国家职能”必须从广义上理解是指国家适当开展的活动，该词包括国家适当履行的立法、司法、行政或其他职能。因此，“国家官员”是履行或可能履行这些国家职能的个人。提到行使国家职能，就更准确地界定了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必要联系，可以避免对官员的概念作广泛解释而不充分考虑授予个人豁免是为了国家利益和维护国家主权。虽然为反映这一想法提出了各种词语，如“公共权力的特权”、“公共职能”、“主权权力”、“政府权力”、“国家固有职能”等，但委员会选择了最适合本阶段工作的“国家职能”一词。这种选择有两个原因：一是它充分反映了国家与官员之间的联系，这种联系与后者的职责有关；二是使用“职能”一词，而不是“以国家名义实施的行为”，避免了豁免的主体要素(官员)与客体要素(行为)之间可能的混淆。无论如何，在委员会工作的现行阶段，应在尽量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这些词语，同时铭记“国家职能”的确切内容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状况和组织能力。但有些委员会委员认为所选择的词语不当。

(12) 本条草案中使用的“代表”和“行使”两词不得被解释为是对豁免的时间范围的任何表述。使用这两个词是为了一般性地确定国家与官员之间的联系，与国家官员在请求豁免时是否必须仍为官员无关。属人豁免和属事豁免的时间范围是其他条款草案讨论的问题。

⁹ 见 A/CN.4/673,第 111 段，第 37 页和特别报告员最初提出的该条草案(同上，第 143 段，第 53 页)。

¹⁰ 见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 1 条草案评注第(4)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第 49 段，第 53 页)。

¹¹ 见委员会第六十五届会议暂时通过的第 3 条草案评注第(2)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第 49 段，第 58 页)。

(13) 对界定“国家官员”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个人与国家的联系，这种联系的形式则无关紧要。委员会认为这种关系可有许多形式，具体取决于国家立法和每个国家的惯例。但大多数委员会委员认为，对这种关系的解释不能太广泛，将任何事实上的官员、包括合同人员都包括在内。“事实上的官员”一词用于指许多可能的情况，个人可否为本条款草案的目的被视为国家官员，取决于每个具体情况。特别是，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没有足够的实践可以断定，与一国有联系、在该国境外行事的合同人员可根据国际法的一般规则享有外国刑事管辖豁免。无论如何，可结合“以公务身份实施的行为”，更加适当地处理与事实上的官员有关的问题。

(14) 鉴于“国家官员”的概念完全基于有关个人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这一点，因此，其职位高低与定义的唯一目的无关。尽管实践表明在多数情况下，为豁免目的被视为国家官员的个人担任较高或相当高的职位，但也可找到这类人员职位较低的例子。因此，职位的高低虽可为确定某一人员是否是本条款草案规定的官员提供某些提示，但它不是国家官员定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15) 最后，必须铭记的是，“国家官员”的定义与豁免涵盖的行为种类毫无关系。因此，“代表”和“行使国家职能”不能被解释为以任何方式界定豁免的实质范围。同样，“国家官员”的定义也不能被解释为包含对豁免例外情况的说明。这两个问题将在晚些时候讨论。

(16) 关于术语问题，在国家官员的外国刑事管辖豁免工作的现阶段，委员会认为没必要改变用来指享有豁免权的人员的词语。因此，继续在英文中使用“State official”、在法文中使用“*représentant de l'Etat*”、在西班牙文中使用“*funcionario del Estado*”、在阿拉伯文中使用“.....”、在中文中使用“.....”、在俄文中使用“.....”。虽然委员会认识到这些词语的所指并不相同，而且不能互换，但仍倾向于使用这些词语，尤其是因为实践中广泛使用的英文“State official”一词适于指本条款草案提到的所有类别人员。因此，各语文本中使用的不同词语并无任何语义方面的重要意义。相反，为了本条款草案的目的，每个语文本中使用的各词语含义相同，与其在国内法律制度中的含义无关。委员会将在适当时候决定是否作出修改或就这些词语在国内法或国际文书中的使用添加一个保留条款，以防止负责在国家层面适用豁免的机构对本条款草案使用“国家官员”一词的方式作出错误解释。

第5条草案

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

国家官员在以此种身份行事时，对外国行使的刑事管辖享有属事豁免。

评注

(1) 第 5 条草案是关于属事豁免的第一条草案，意在界定这类外国刑事管辖豁免的主体范围。因此，本条草案与关于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员的第 3 条草案平行。它具有相同的结构，比照采用了委员会已就第 3 条草案达成一致的同样措词和术语。直接去掉了提到享有豁免的实际人员的文字，而在属事豁免情况下将这些人员界定为“国家官员在以此种身份行事时”。

(2) 本条草案中使用的“国家官员”一词应从第 2 条草案(e)项赋予它的意义上理解，即“代表国家或行使国家职能的任何个人”。与享有属人豁免的人员情况相反，委员会认为无法拟订享有属事豁免的人员名单。实际上，这类人员必须适用第 2 条草案(e)项规定的标准逐案确定，这些标准强调了官员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为本条草案的目的，必须适当谨记第 2 条草案(e)项的评注。¹²

(3) “以此种身份行事”指的是官员实施的行为的公务性质，强调了属事豁免的职能性，并确立了与属人豁免的区别。鉴于属事豁免的职能性，有些委员会委员对是否需要界定享有这种豁免的人员表示怀疑，因为在他们看来，属事豁免的本质是所实施的行为的性质，而非实施这些行为的个人。不过，委员会多数委员认为，应当确定享有这种豁免的个人，因为外国刑事管辖豁免适用于所有人。提到享有属事豁免的“国家官员”必须是“以此种身份”行事的人，这丝毫没有提示这类豁免可能涵盖的行为，这些行为将在单独的一条草案中讨论。出于同样的原因，也没有使用“以公务身份行事”一语，以避免与“以公务身份实施的行为”的概念相混淆。

(4) 根据委员会 2013 年暂时通过的第 4 条草案第 3 款，¹³ 属事豁免也适用于以国家官员身份行事的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不过，委员会认为没有必要在本条草案中明确提及这些官员，因为属事豁免之所以对其适用，并非是因为他们的身份，而是因为他们是在任期间以此种身份行事。尽管委员会认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外交部长只在离任后才享有严格意义上的属事豁免，但没有必要在第 5 条草案中提到这一点。将在今后一条关于属事豁免实质范围和时间范围的草案中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广泛的讨论，该条草案将仿照第 4 条草案拟订。

(5) 第 5 条草案不妨碍属事豁免的例外情形，这些例外也将在晚些时候讨论。

¹² 见上文第.....段，第.....页。

¹³ 这项规定为：“属人豁免的停止不妨碍关于属事豁免的国际法规则的适用”（《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8/10，第 48 段，第 52 页）。关于这一“不妨碍”条款的范围，见第 4 条草案评注第(7)段(同上，第 49 段，第 70 页)。

(6) 最后，必须注意的是，第 5 条草案与第 3 条草案一样，使用“外国行使的刑事管辖”一语来指享有属事豁免的个人。这种表达说明了豁免与外国刑事管辖的关系，并强调了对具体行为行使外国刑事管辖时发挥作用的豁免本质上的程序性质。¹⁴

¹⁴ 见第 3 条草案评注第(13)段(《大会正式记录，第六十五届会议，补编第 10 号》，A/68/10, 第 49 段，第 66 页)。